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图书馆 主办

SHANGHAI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LIBRARY



经管学科参考

2021 年第 2 期 总第 42 期

经管学科参考

2021 年第 2 期 · 总第 42 期

热点观察

同舟共济克时艰，命运与共创未来.....	1
持续推进高水平开放为发展注入新动能.....	3
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4
推动农村集贸市场高质量发展.....	5

学科前沿

数字经济发展变革国际贸易市场.....	6
美联储政策目标重心已发生实质性变化.....	9
2020 年非洲研究发展报告.....	12
从文化管理走向文化治理.....	17

经管资讯

最大外资流入国的底气.....	19
新苏伊士运河危机与全球供应链的系统性风险.....	20
疫情失控拖累印度经济复苏进程.....	21
第三轮疫情紧急状态考验日本经济.....	22

责任编辑：董岳珂

编辑：李 岩

日期：2021 年 04 月 20 日

同舟共济克时艰，命运与共创未来

——在博鳌亚洲论坛 2021 年年会开幕式上的视频主旨演讲

(2021 年 4 月 20 日，北京)

尊敬的各位国家元首、政府首脑，

尊敬的各位国际组织负责人，

尊敬的各位博鳌亚洲论坛理事，

各位来宾，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与君远相知，不道云海深。”很高兴出席博鳌亚洲论坛 2021 年年会，同大家在“云端”相聚。首先，我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对出席会议的线上线下所有嘉宾，表示热烈的欢迎！对各位新老朋友，表示诚挚的问候和美好的祝愿！

今年是论坛成立 20 周年。20 年来，亚洲国家深入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协力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推动亚洲成为全球经济最具活力和增长潜力的地区。亚洲和世界各国携手应对恐怖主义、印度洋海啸、国际金融危机、新冠肺炎疫情等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努力维护地区稳定和安全。作为亚洲大家庭重要成员，中国不断深化改革开放，积极推动地区合作，与亚洲同进步，与世界共发展。论坛见证了中国、亚洲、世界走过的不平凡历程，为促进亚洲和世界发展发挥了重要影响力、推动力。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本届年会是在特殊背景下召开的。年会以“世界大变局：共襄全球治理盛举，合奏‘一带一路’强音”为主题，恰逢其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当前，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叠加，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显著上升。人类社会面临的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发展赤字、和平赤字有增无减，实现普遍安全、促进共同发展依然任重道远。同时，世界多极化趋势没有根本改变，经济全球化展现出新的韧性，维护多边主义、加强沟通协作的呼声更加强烈。我们所处的是一个充满挑战的时代，也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

人类社会应该向何处去？我们应该为子孙后代创造一个什么样的未来？对这一重大命题，我们要从人类共同利益出发，以负责任态度作出明智选择。

中方倡议，亚洲和世界各国要回应时代呼唤，携手共克疫情，加强全球治理，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向不断迈进。

——我们要平等协商，开创共赢共享的未来。全球治理应该符合变化了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历史趋势，满足应对全球性挑战的现实需要。我们应该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要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国际上的事应该由大家共同商量着办，世界前途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不能把一个或几个国家制定的规则强加于人，也不能由个别国家的单边主义给整个世界“带节奏”。世界要公道，不要霸道。大国要有大国的样子，要展现更多责任担当。

——我们要开放创新，开创发展繁荣的未来。开放是发展进步的必由之路，也是促进疫后经济复苏的关键。我们要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巩固供应链、产业链、数据链、人才链，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要深化互联互通伙伴关系建设，推进基础设施联通，畅通经济运行的血脉和经络。要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在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现代能源等领域加强交流合作，使科技创新成果更好造福各国人民。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开放融通是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人为“筑墙”、“脱钩”违背经济规律和市场规则，损人不利己。

——我们要同舟共济，开创健康安全的未来。战疫仍在进行，胜利终将到来。我们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加强信息共享和联防联控，提升卫生医疗合作水平，充分发挥世界卫生组织关键作用。要加强疫苗研发、生产、分配国际合作，提高疫苗在发展中国家的可及性和可负担性，让各国人民真正用得上、用得起。要全面加强全球公共卫生安全治理，共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要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共同推进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加大落实应对气候变化《巴黎协定》。要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解决发展中国家在资金、技术、能力建设方面的关切。

——我们要坚守正义，开创互尊互鉴的未来。多样性是世界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的魅力所在。经历了疫情洗礼，各国人民更加清晰地认识到，要摒弃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反对任何形式的“新冷战”和意识形态对抗。国与国相处，要把平等相待、互尊互信挺在前面，动辄对他国颐指气使、干涉内政不得人心。要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不同文明交流互鉴，促进人类文明发展。

在此，我宣布，中方将在疫情得到控制后即举办第二届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为促进亚洲和世界文明对话发挥积极作用。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我多次说过，“一带一路”是大家携手前进的阳光大道，不是某一方的私家小路。所有感兴趣的国家都可以加入进来，共同参与、共同合作、共同受益。共建“一带一路”追求的是发展，崇尚的是共赢，传递的是希望。

面向未来，我们将同各方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弘扬开放、绿色、廉洁理念，努力实现高标准、惠民生、可持续目标。

——我们将建设更紧密的卫生合作伙伴关系。中国企业已经在印度尼西亚、巴西、阿联酋、马来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等共建“一带一路”伙伴国开展疫苗联合生产。我们将在传染病防控、公共卫生、传统医药等领域同各方拓展合作，共同护佑各国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我们将建设更紧密的互联互通伙伴关系。中方将同各方携手，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以及规则标准“软联通”，畅通贸易和投资合作渠道，积极发展丝路电商，共同开辟融合发展的光明前景。——我们将建设更紧密的绿色发展伙伴关系。加强绿色基建、绿色能源、绿色金融等领域合作，完善“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等多边合作平台，让绿色切实成为共建“一带一路”的底色。

——我们将建设更紧密的开放包容伙伴关系。世界银行有关报告认为，到2030年，共

建“一带一路”有望帮助全球 760 万人摆脱极端贫困、3200 万人摆脱中度贫困。我们将本着开放包容精神，同愿意参与各相关方共同努力，把“一带一路”建成“减贫之路”、“增长之路”，为人类走向共同繁荣作出积极贡献。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2021 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100 年来，中国共产党筚路蓝缕、求索奋进，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不仅使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也为人类文明和进步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中国将继续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中国将始终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拓展同各国友好合作，积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中国将继续同世界卫生组织以及各国开展抗疫合作，坚守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的承诺，为发展中国家战胜疫情提供更多帮助。中国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永远不称霸、不扩张、不谋求势力范围，不搞军备竞赛。中国将积极参与贸易和投资领域多边合作，全面实施《外商投资法》和相关配套法规，继续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推动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欢迎各方分享中国市场的巨大机遇。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同舟共济扬帆起，乘风破浪万里航。尽管有时会遭遇惊涛骇浪和逆流险滩，但只要我们齐心协力、把准航向，人类社会发展的巨轮必将行稳致远，驶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谢谢大家。

作者：习近平

来源：《人民日报》2021 年 4 月 21 日第 002 版

持续推进高水平开放为发展注入新动能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加剧了变局的演变，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上升，国际经济、科技、文化、安全、政治等格局发生深刻调整，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面对深刻复杂变化的环境，我国更需坚定推进高水平开放进程。

以扩大内需为导向推进高水平开放，需要构建更加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实现内外市场联通、要素资源共享，这就要求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加快形成与大国经济相适应的开放型市场体系。进入发展新阶段，扩大内需引领高水平开放中的基本导向作用全面凸显：一方面，消费结构升级对世界多样化高品质的产品、服务产生更多需求。到 2030 年，我国累计商品进口额有望超过 22 万亿美元；另一方面，随着我国经济全面深度融入世界，释放 14 亿人的超大规模市场潜力，既是我国推进高水平开放的独特优势和基本条件，又是我国以更高水平开放融入国际经济循环的基本条件。

以强大国内市场推动全球自由贸易进程。依托强大国内市场，加快推进多边双边自由贸

易进程，有效应对单边主义与贸易保护主义，为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与全球经济复苏注入中国动力。首先，要推进高水平双边区域自由贸易进程。要按照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相关开放承诺，加快出台相关配套措施，推动海关、监管、投资等国内相关政策、制度调整，以此推动 RCEP 尽快落地。与此同时，积极考虑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要在服务贸易、知识产权协定、竞争中立、电子商务、政府采购、国有企业和指定垄断、中小企业、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ISDS）等方面加快形成新的制度安排，在新时期国际产业合作中把握更大主动权，并由此形成深化市场化改革的新动力。其次，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要统筹产能合作与服务贸易，形成“一带一路”产业链与供应链新布局。以服务贸易和数字贸易为重点积极参与全球经贸规则制定。服务贸易与数字贸易快速增长，逐渐成为全球经贸规则重构的焦点。从推进全球自由贸易进程出发，积极参与和引领建设开放、包容、共享、均衡的区域性和全球性服务贸易协定，引领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平等参与区域和全球服务贸易体系建设，提出符合发展中国家实际的服务贸易与数字贸易规则，释放全球服务贸易需求潜力。

以制度型开放推动构建高水平市场经济体制。在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上升的特定背景下，保持战略定力，办好自己的事，关键在于把握高水平开放与深层次市场化改革互促共进的时代特征，走出一条以高水平开放促进深层次市场化改革的新路子。

我国实现高水平开放新突破重在加强制度性、结构性安排。所谓“制度性”，其重点是开放市场、公平竞争，建立与国际基本经贸规则相衔接的开放型经济体系。所谓“结构性”，重点是扩大对外开放的领域和范围，即从一般制造业领域的开放扩大到以金融等为重点的服务业领域开放。这就需要加快推动以货物贸易为主向以服务贸易为重点的开放转型进程，需要加快推动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的转型进程。

开放是最大的改革，制度性变革依赖于制度型开放。推进规则、规制、标准、管理等制度型开放，是形成以服务贸易为重点高水平开放新格局的基本需求，并成为服务业领域制度性变革的重大任务。

“十四五”时期，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需要在服务业领域的制度型开放和制度性变革上实现重大突破。一方面，要推进服务贸易领域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更大程度与国际接轨；一方面，要实质性推动服务业领域市场对内对外开放进程，尽快打破服务业领域的各类市场垄断与行政垄断。

作者：迟福林

来源：《经济参考报》2021年4月16日第001版

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对此，“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设立专章进行了具体部署。当前，我国经济已经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和创新链体系，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能够促进全球资金、技术、人才、数据、服务等要素自由流动，增强我国供应链体系的稳定性；优化组合全球创

新资源，高质量利用外资，汇集全球人才，吸收借鉴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和新的管理方式等，促进我国产业迈向中高端；通过规则、规制、标准、管理等制度型开放，形成与高水平国际经贸规则相衔接的制度体系，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焕发出强大活力；等等。可见，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对于我国在新发展阶段抓住新机遇、应对新挑战，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具有重大意义。

推动更大范围开放。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与参与国家加强合作，为贸易、投资等开辟更广阔的市场。通过积极参与国际经贸规则制定深化与其他经济体互利共赢合作，促进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深度融合。大力实施自由贸易区提升战略，优化自由贸易区布局，提升自由贸易区建设水平，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推动更宽领域开放。通过高质量“引进来”和高水平“走出去”有效配置全球优质要素资源，进一步深化服务业开放、提高制造业开放质量、扩大农业开放，把推动金融、数字技术、研发设计、医疗健康、文化教育等现代服务业开放作为提高供给质量、扩大消费需求、推动产业创新的重要抓手。全面提升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推动数字贸易开放发展。把握数字经济时代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新趋势，引导企业在全域开放创新中主动作为，加快培育以技术、标准、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的对外经济新优势。推动更深层次开放。以推动高水平国际经贸规则建设为抓手，继续深化贸易、投资、金融等领域的管理体制变革，加快推进制度型开放。进一步完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模式，进一步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继续放宽市场准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推动合作共赢开放。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在国际经贸规则变革中主动作为，坚定不移维护多边体制，坚决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等区域合作中发挥重要促进作用，在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中发挥建设性作用。支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发挥协调作用，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

统筹开放和安全。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健全开放安全保障体系，在开放发展中提高风险防范能力。充分考虑未来我国面临的国际环境更加复杂多变、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因素相互交织、风险传导机制和渠道更加多样化的形势，把安全摆到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谋划，切实维护人民安全、政治安全、金融安全、网络数据安全、能源资源安全、粮食安全、公共卫生安全、海外发展利益安全等。健全风险预警监测防控体系，避免出现系统性风险。

作者：王晓红（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副部长）

来源：《人民日报》2021年4月15日第009版

推动农村集贸市场高质量发展

促进农村集贸市场健康规范发展对形成强大国内市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意义重大。应多方合力、协同共治，推动农村集贸市场高质量发展，促进农村消费潜力加快释放、农民消费加速提档升级。

前不久，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的《2020年60个农村集贸市场“再体验”调查报告》显

示，60个受调查的农村集贸市场实地体验总得分为65.14分，连续两年稳步增长；超八成消费者认为农村集贸市场环境得到改善。这些调研数据佐证了我国农村集贸市场发展稳中有进的好态势。农村集贸市场是城乡居民生活往来和消费的重要场所，发展农村集贸市场是繁荣城乡经济的重要环节，对推进区域经济增长有积极意义。作为基础配套设施，各类农村集贸市场关系到百姓吃穿用等方方面面，是提升居民生活品质的重要因素，也是充分挖掘农村消费潜力的重要渠道。近年来，我国农村集贸市场消费环境整体上不断向好，推动着农村居民消费不断升级，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调查结果显示，近一年来农村集贸市场上的问题商品出现反弹式增长，“三无”产品问题未见好转，值得引起足够重视。此外，环境卫生脏乱差问题依然存在；维权方便与售后服务方面还有待加强。这表明，持续做好农村集贸市场经营管理、提升商品质量和市场服务水平仍然任重道远，须臾不可松懈。这些顽疾存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就拿问题商品来说，其数量不减反增，主要是因为随着农村消费市场发展不断提速扩面，大量商品和服务涌入县乡地区，少数不良商家趁机通过以次充好来“赚快钱”，导致市场鱼龙混杂；其次是农村集贸市场监管仍存漏洞，落实经营者主体责任还不够，也给了问题商品可乘之机。整治农村集贸市场违法违规行为，营造更加规范、公平、安全、有序的市场环境已迫在眉睫。

建设高质量农村集贸市场、有效扩大农村消费，需要多方合力、协同共治。在监管端，各方监管力量要进一步明确农村集贸市场的管理权责单位，做好农村集贸市场的经营管理、维护和更新，做好市场流通情况的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各类商品和服务的问题。市场监管部门要加强对农村集贸市场的精细化管理。比如，严格推行不法经营商户“黑名单”制度，让严重违法失信者无法立足；设立投诉服务窗口，进一步畅通消费者维权渠道。在流通端，相关经营主体要大力落实主体责任，主动配合有关部门和单位做好市场监管、食品安全、卫生、税务、消防等方面的监督检查和执法，自觉接受管理和监督；同时，要做强做大集中生产、集中采购、统一配送的农村集贸市场供应链体系，强化与大型商贸公司或主流电商企业的合作，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优惠的价格为农村消费者提供品类更丰富、质量更过硬的商品，不断满足农村消费者多样化、个性化的生产生活需求。在消费端，要引导广大农村消费者提高品质消费和维权意识，增强在食品消费、金融消费等领域的权益保护意识和法律素养，提升对商品品牌和品质的鉴别能力，对假冒伪劣产品和坑蒙拐骗行为坚决说“不”，遇到消费纠纷主动向有关机构、组织提供线索，增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能力。促进农村集贸市场健康规范发展对形成强大国内市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意义重大。有关方面应不断增加农村品质消费供给、便利消费维权，推动农村集贸市场高质量发展，促进农村消费潜力加快释放、农民消费加速提档升级。

作者：齐志明

来源：《人民日报》2021年4月7日第019版

学科前沿

数字经济发展变革国际贸易市场

以云计算、大数据以及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数字技术，正在深刻而广泛地改变着社会经济

生活的方方面面，亦在深刻影响国际贸易的市场格局及生产组织结构。如何在全球数字化浪潮中把握数字技术革命带来的新机遇，依托我国产业结构特征构建国际贸易新竞争优势，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为深刻理解数字经济发展给国际贸易带来的机遇与挑战，需要重点关注数字经济对国际贸易市场的变革，并厘清其中的内在机理与深层次逻辑。

1 贸易参与主体多元化

数字经济发展促使贸易市场参与主体更加多元化，呈现出明显的普惠性特征。

第一，数字技术的发展与应用降低了企业进入出口市场的“门槛”，推动了更多中小企业参与国际贸易。企业进入出口市场需要付出包括获取跨境订单、磋商交易细节以及交付商品等一系列成本，进而形成了所谓的贸易“门槛”，使得生产率较低、缺乏相关专业人员、资金实力较弱的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难以进入国际市场。在数字经济时代，互联网市场的出现大幅降低了跨境展示商品、获取海外订单的成本，数字技术的应用使得跨境沟通、结算、物流协调更加便利，电子化政务改革简化了企业出口的流程，进而使得贸易“门槛”不断降低，更多中小企业开始进入国际贸易市场。同时，由此引发的竞争水平加剧使得贸易向“买方市场”偏移，谁能够更好、更快地满足市场需求，便能够在市场中占据更重要的地位，而中小企业由于组织结构简单，响应速度更快，具有更加明显的竞争优势，同时也倒逼大型跨国企业进行事业部分拆等扁平化转型，最终使得国际贸易市场集中度不断降低，参与主体呈现出普惠性特征。

第二，数字化转型以及生产要素线上市场的出现降低了出口生产成本，提升了出口生产率与竞争力。首先，出口企业生产流程以及内部管理的数字化、信息化提高了其生产效率与企业管理水平。其次，区域市场分割与行业垄断等因素造成的要素扭曲是导致我国生产要素整体配置效率不高、资源错配严重等问题的重要原因，同时，区域市场分割也使得企业在国内生产销售面临更大压力，生产率较低的企业为生存不得不转向出口市场，而竞争的加剧使原本就同质化严重的出口企业唯有通过降低产品价格谋求市场份额，进一步使大量中小企业在“内外夹击”下退出市场。而线上要素市场具有“全国统一市场”的重要特征，中小企业在全国范围内配置生产要素能够有效降低生产成本，出口竞争力得以提升。线上市场的良好发展也会与线下要素市场形成竞争，倒逼整个区域要素市场提升配置效率，同时助推我国整体产业布局向着更加高效的方向发展，有利于为我国出口市场营造良好竞争环境。

第三，数字经济的发展有效赋能企业创新，为中小企业培育出口竞争优势提供了动能。首先，依托互联网形成的共享氛围增加了知识、经验等创新源泉的社会供给，线上高质量的知识分享、专业问答层出不穷，企业获取创新相关信息的成本大幅降低。其次，数字技术的应用拓宽了企业研发创新的渠道，网络平台提供的基础技术共享服务大幅降低了企业的创新成本。此外，数字经济时代的出口市场竞争加剧也增加了企业研发创新的内在驱动力，加之资金、技术、人才对研发创新的约束降低，推动了其通过产品及流程创新不断增加自身竞争力，也使中小企业在出口市场中的地位不断提升。

第四，数字技术的发展及其与传统行业的融合应用，提高了中小企业的抗风险能力。一方面，中小企业能够利用互联网快速感知国际市场变化信息，并通过数字化生产管理系统及时做出生产及库存调整，提高了其抵抗市场波动风险的能力。另一方面，互联网金融的发展降低了中小企业的融资约束，拓宽了其融资渠道。互联网依托“雁过留痕”的重要特性，通过提供交易数据等信息，能够为中小企业的信用评估进行有效补充，互联网赋能下的普惠金融也为中小企业提供了更加便利、低廉的融资方式，提高了其资金方面的抗风险能力。

2 贸易产品多样化

数字经济发展推动国际贸易产品趋向多样化、服务化。

第一，数字技术的应用打通了市场需求端至供给端的信息渠道，使得出口生产企业能够更加快速、直接地了解多样化的市场需求信息，消费端的个性化需求能够及时反馈至供给端，生产流程的智能化、模块化加快了个性化、定制化贸易产品的产出速度。在个性化需求不断被满足的同时，新的需求也不断被激发，由于能够迅速、准确地把握需求信息，出口生产商进行差异化生产可以获取更高收益，最终推动了我国出口产品的多样化发展。

第二，互联网市场打破了实体交易市场的时空限制，使得小众商品也能够具有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效应，进而推动个性化、定制化产品出现在贸易市场当中，使贸易产品呈现多样化趋势。一方面，出口企业展示产品的货架由“有限”趋向“无限”，能够以近乎为0的边际成本在互联网市场中展示更多商品。另一方面，出口市场范围大幅扩大，出口企业能够联通全球市场销售产品，这就使得小众商品能够在全球市场的加成下拥有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带来的超额收益。

第三，贸易市场竞争加剧推动出口企业主动满足市场中的个性化需求，由内在动力驱动的产品多样化为优化出口产品结构、培育外贸新优势提供了新渠道、新机遇。伴随数字经济的发展，贸易“门槛”不断降低加剧了出口市场竞争，而智能化生产调整、互联网赋能下的创新成本降低以及创新溢出效应提升，使得企业能够快速以较低成本推出相应的个性化产品，由此使得企业具有较强的通过生产差异化产品满足个性化需求的内在驱动力，最终有利于打破长期以来出口产品同质化严重的桎梏，为我国出口提供“质”的可持续增长点。

第四，网络传输速度的提升以及交互方式的创新，使得对服务标的“面对面”交付的限制放松，数字技术的应用与不断发展打破了地理距离以及时间的约束，降低了服务贸易的成本，由此使得商务咨询、远程医疗等服务的跨境交付愈发可行，而由于服务贸易较货物贸易具有更高的附加值，因此使得其在国际贸易市场中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

3 组织结构网络化

数字经济发展使得贸易生产组织结构呈现网络化、智能化趋势。

第一，数字经济的发展使得市场协调成本不断降低，推动了分工的进一步细化，赋能形成网络化生产组织方式的同时，降低了由信息不对称带来的资源错配。数字技术的应用使得信息流通的效率不断提升，大幅降低了企业间以及产业链间的沟通与协调成本，由此推动了我国出口生产中的分工细化，充分释放了由分工专业化带来的生产效率提高，进而促进了我国整体出口竞争力的提升。同时，数字技术的应用提高了生产资源的协调管理水平与配置效率，企业能够更加快速地根据外部市场信息调整内部生产结构，将生产要素配置到真正需要的产品生产当中。从产业角度看，互联网的“全国统一市场”特性推动了出口生产的跨区域协调与分工，由于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以及产业链间能够快速进行协调，区域内的产业会将更多的生产资源配置到更具比较优势的产业，由此降低了区域间的资源错配，有助于提升我国整体出口竞争力。

第二，数据作为新的生产要素参与出口生产，市场信息的深度挖掘以及快速响应使得“按需生产”得以实现。面对波动加剧的出口市场，企业“按需生产”逐渐成为主流，线上营销、网络调研以及用户分析在节约大量成本的同时也包含了更加全面、有价值的市场信息，

而数据处理技术的不断进步使得市场数据的价值能够被充分挖掘，终端市场的“需”能够被快速、全面获知。与此同时，出口企业生产管理流程的数字化，使得企业能够快速根据生产要素价格以及出口市场需求变化调整出口商品的生产，通过智能化最大限度降低由库存带来的成本，真正实现“产”与“需”的高效能对接。

第三，数字经济的发展推动了出口生产的服务化转型。一方面，数字技术的发展与应用促进了出口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的深度融合，客户数据的沉淀使得制造业企业能够通过挖掘客户的深层次需求，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另一方面，全球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提高了出口市场的竞争水平，促使我国制造业企业将战略重点逐步转向服务化，通过不断提高从研发到售后的全流程客户服务水平，提高自身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力。此外，数字技术的发展降低了市场协调成本，生产性服务的“外包”变得可行，而“外包”服务不但能够提高出口制造业企业服务客户的质量，也推动了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的专业化发展。

总体来看，数字经济的发展引发了国际贸易市场的深刻变革。在数字经济时代，积极引导出口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与风险防控，打通数字技术作用于贸易市场的关键堵点、痛点，是我国把握数字新机遇、优化出口结构、提升出口竞争力的重点所在。

作者：范鑫(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年4月28日第003版

美联储政策目标重心已发生实质性变化

长期以来，美联储的两大货币政策目标是物价稳定与充分就业，通常物价稳定放在首位。然而，近期我们观察到美联储货币政策目标的重心已经发生了转变，更加侧重于实现充分就业而非物价稳定。美联储货币政策目标重心改变，与美国当前面临的国内外形势有关。“一切以经济增长为重”已在美国政策制定者中达成共识，美国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正在与经济复苏赛跑。目前市场对美联储货币政策目标的理解还停留在过去的思维模式，担心通胀形势会引发货币政策提前收紧。实际上，美联储货币政策目标重心已经发生改变，市场对美联储政策意图的理解也要转变思路。

1 美联储政策目标正由抑通胀转向经济增长

尽管物价稳定与充分就业都是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目标，但现实中某些时期的政策侧重点会有所不同。例如，20世纪80年代初，时任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克尔为控制高通胀而紧缩货币，物价稳定成为美联储的主要目标，为此不惜牺牲经济增长。最终通胀率下降、失业率上升，而稳定的物价环境为美国80年代中后期开启的经济繁荣打下了坚实基础。近期美联储货币政策目标的重心开始向充分就业、经济增长倾斜，与沃克尔时期的政策重心截然不同。我们从近期的政策和讨论中可见端倪。

一是最近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反复提及不会考虑加息，并强调尽管未来几个月物价会上升，但劳动力市场还没有恢复。4月14日，鲍威尔讲话称，虽然美国经济复苏正在加速，但失业率仍高于疫情前，将等到就业完全恢复后再考虑加息。更早些时候，3月美联储FOMC会

议后，美联储官员也一致认为，尽管经济有所改善，但远未达到美联储的就业目标。

二是 2020 年 8 月 27 日，美联储修改了其货币政策框架文件《长期目标和货币政策策略声明》，考虑实行“平均通胀目标制”。引入“平均通胀目标制”意味着美联储主动将短期通胀目标定在 2% 以上，理由是一些时期的低通胀使得长期通胀率仍不超过 2%。该声明中还对就业目标进行了修改，提升了就业目标的重要性，将就业目标的表述由充分就业的双向“偏离”改为单向“缺口”，表明美联储更加注重推动就业市场的修复。

三是早在疫情暴发前，现代货币理论（MMT）以及财政赤字货币化引起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这表明人们对通胀的担忧在减弱。尽管现代货币理论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就已诞生，但一直较为冷门，直到近两年才备受追捧，这与近年来发达国家“不惜一切”代价追求经济增速的诉求密切相关。2008 年金融危机后，发达经济体长期的低通胀环境也弱化了政策制定者对通胀风险的担忧。

上述现象表明美联储政策目标越来越向经济增长倾斜。美联储认为通胀威胁不大，在与市场的沟通中也反复强调会容忍通胀在一段时间内高于 2%，但目前市场人士普遍担忧上行的通胀风险会触发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

2 美联储政策目标转变的深层次原因

此次美联储货币政策目标重心侧重于经济增长，与美国国内外的经济政治环境密不可分，并且已经在美国政策层面达成了高度一致。

一是美国国内日益加速的贫富差距与民粹主义，需要通过经济增长来安抚。根据经济学家 Saez（萨兹）和 Zucman（祖克曼）的最新测算，美国 1% 的人口所拥有的税前收入占总收入比例达 19%，0.1% 的人口所拥有的财富占总财富比例达 18%。特别是疫情冲击下，低收入群体的失业问题加剧，民粹主义和社会不满情绪进一步发酵，唯有通过增加就业、促进经济增长才能弥合社会分化的裂痕。

二是美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迫使其想方设法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实现较快的经济增长，否则将影响其国际地位。当前国际竞争呈多极化发展趋势，尽管美国在经济、科技、军事等方面的领先地位没有改变，但与其他国家之间的相对差距在缩小。前任总统特朗普执政期间，美国与其传统盟友的关系出现裂痕，对美国维持全球领导地位形成了较大挑战。同时，中国的快速发展也被美国误认为是一种威胁。因此，尽快恢复和保持经济增长是美国应对国际竞争、维持全球领先地位的迫在眉睫的选择。

三是美国财政、货币政策的“正常化”高度依赖美国经济增速提升。为刺激经济复苏，拜登政府上台以来已经出台了 1.9 万亿美元经济刺激计划，3 月联邦政府财政赤字高达 6600 亿美元，创该月历史新高。扩大的财政赤字需要大量发行政府债券予以支撑。近年来外国投资者持有美债比例持续下降。对比 2009 年，2020 年外国持有者占比从 30.1% 降至 25.6%，尤其是外国官方占比从 22.0% 降至 15.2%。而美联储持有美债余额的占比则从 2009 年的 6.5% 大涨至 2020 年的 17.0%。为配合积极的财政政策，2020 年美联储持有新发美债比例达到 53%。美国宽松的财政、货币政策已经深度捆绑。美债还本付息依赖于美国财政收入，而美国财政收入的主要构成是税收收入。2020 年美国财政收入的 96.6% 来源于税收收入，其中个人所得税占比 47.2%，企业所得税占比已从 2016 年的 9.2% 降至 2020 年的 6.2%。4 月 8 日，财政部长耶伦表示将加征企业税为拜登政府的财政支出提供资金。因此，长期来看美债还本付息、财政赤字缩减以及美联储减少购买美债，都高度依赖于税收收入增长，而税收收入又与就业

水平、经济增速紧密相关。

有趣的是，近期拜登称其上任两个多月来，没有与鲍威尔交谈，以支持美联储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言下之意，美联储宽松的货币政策是其自身决策，而非政府干预。由此可见，无论是拜登政府经济刺激法案、税改计划，还是美联储货币政策，都无一例外地在“一切以经济增长为重”上达成了高度一致。

3 美国的宽松财政货币政策与经济复苏在赛跑

为对冲疫情冲击，美国实施了极度宽松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在不到一年时间内，美联储资产负债表从 3.8 万亿美元扩张到 7.3 万亿美元，几乎扩张了一倍，M2 同比增速从疫情前的 6.7% 上升至今年 2 月的 27.1%，2020 年末美国政府债务余额达到 27.7 万亿美元。随着疫情缓解与疫苗接种普及，人们逐渐走出家门，前期着力于居民需求端的政府救助计划进一步推升通胀率，3 月 CPI 同比增速达到 2.6%，已经明显高于疫情前水平，创下 2018 年 8 月以来新高。核心通胀率也呈现上升态势，3 月核心 CPI 同比增速达到 1.6%。随着经济复苏进程加快，通胀率还有进一步上行的空间。

不仅通胀率在上升，资产价格也创下新高。今年 3 月末，美国三大股指已经较去年 3 月下旬低点反弹 77.4%-93.1%，甚至较疫情前高点上涨 11.6%-36.2%。今年 1 月美国标普 CaseShiller 全国房价指数同比增速达 11.2%，较疫情前提升了近 8 个百分点。近期美国经济复苏、通胀预期以及美债供求关系变化，推高美债收益率，而作为重要的定价基准，美债收益率上行会影响资产估值。近期耶伦和鲍威尔都表示，当前资产价格高涨，但不构成恐慌理由。他们一方面认为金融系统具有较强韧性，另一方面寄希望于经济复苏带动的企业业绩提升和就业与收入增长能够支撑资产价格。

无论是狭义通胀率上冲还是广义资产价格高企，都在美联储的容忍范围内，这说明当前美国仍然以恢复经济、增加就业为政策着力点，为此宁愿牺牲短期物价稳定的目标。如果宽松的财政、货币政策最终能够成功托举经济，实现经济复苏的目标，那么经济增长就能解决就业、税收、政府债务、社会稳定以及国际地位等一连串问题，即使这个目标的实现以牺牲一部分通胀为代价。反之，如果宽松的财政、货币政策没有赢得与经济复苏之间的赛跑，那么可能陷入经济滞胀、政府债务高企的困境。

4 市场对美联储货币政策目标的理解也要转变思路

既不同于保罗·沃克尔时代致力于对高通胀的强力打压，也不同于 2008 年金融危机后致力于与低通胀做斗争，近期美联储货币政策目标重心已经发生改变，更加侧重于经济增长。尽管在与市场的沟通中，美联储反复强调关注经济复苏的可持续性，表达了对短期通胀的容忍度，但市场对美联储货币政策目标的理解还停留在以前对 2% 通胀目标的实现上，面对通胀走高犹如惊弓之鸟。随着美联储货币政策目标的改变，市场对美联储政策运行框架的理解也需要转变思路。

从我国实践看，《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我国货币政策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3 月份我国 CPI 同比增速 0.4%，核心 CPI 同比增速 0.3%，仍维持在较低水平。随着消费恢复，CPI 将有所上升，但由于我国供给能力较强，同时随着猪肉价格下降，预计全年 CPI 不超过 2.5%。最近上海、深圳等一线城市房价热度较高，3 月 70 个大中城市中房价环比上涨城市数量有所增加。今年 3 月，70 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

指数同比增长 4.4%，尽管比 2 月份高 0.3 个百分点，但增速仍为近年来的低位。中国房价调控政策收效明显。胡润研究院发表的《2020 年度全球房价指数》报告称，去年内地只有七个城市进入全球房价涨幅前 50，较 2019 年减少 20 个。整体来看，我国当前经济较快恢复，物价和资产价格水平基本稳定。总之，我国货币政策目标始终是保持物价稳定和促进经济增长。

作者：盛松成(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原司长)

来源：《经济参考报》2021 年 4 月 27 日第 007 版

2020 年非洲研究发展报告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而 2020 年以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推动了国际体系加速演变。与此同时，对于非洲发展而言，2020 年是多数非洲国家独立 60 周年的特殊年份。中国的非洲研究学界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主席致中国非洲研究院成立贺信精神为引领，进一步激发了学者的学术自觉意识，努力推进非洲研究的深化。

1 非洲研究的“三大体系”建设

2019 年 4 月 9 日，中国非洲研究院成立，习近平主席发来贺信。贺信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擘画了新时代中非关系的发展蓝图，阐释了中国与非洲各国进行广泛合作的行动方案，指明了中非文明互鉴、学术和智库资源合作的方向，是加快构建中国的非洲研究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三大体系”的根本遵循。

如何理解与落实习近平主席贺信，成为中国非洲学界深化研究、阐释的重要选题。在习近平主席贺信发表一周年之际，《西亚非洲》杂志和《中国非洲学刊》刊发了多位学者的专题文章。蔡昉指出，贺信对于我们做好非洲研究乃至国际问题研究，加强与非洲学术界、智库及第三方研究机构的合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为此，中国非洲学界在研究非洲人文、经济、社会发展及中非关系问题时，应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宏伟目标出发，立足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大背景；中非学术交流和智库合作，应该立足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平等交往和对等交流，以造福中非各国人民为目标，努力为世界和平与人类发展事业作出更大贡献；在共建共享、互利共赢的基础上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为促进中非关系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通过文明互鉴和人文交流，加强中非双方治国理政和发展经验的研究和分享，促进中非各国民心相通。李新烽结合中国非洲研究院的“交流平台、研究基地、人才高地、传播窗口”四大功能，认为贺信充分体现了习近平主席对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国非洲研究院的殷切期望和重托、对非洲研究和从事非洲研究学者的亲切关怀和激励，为我们认识世界提供了根本遵循，为中国的非洲研究指明了发展方向，为中国非洲研究院划定了坐标、指明了奋斗目标和前进方向。中国非洲研究院通过优化学科布局、创新研究方法、打造交流平台、加快人才队伍建设，将贺信精神付诸实践。张忠祥、吴传华以当前世界形势的特点和中国与非洲的重要地位，评析了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历史地位、典范作用、实践特征。刘鸿武、张艳秋、杨宝荣以贺信中“中非人文交流”为关键词，深入思考和研究中非人文交流的理论基础、战略意义、独特价值，提出了促进学者参与全球智力和智慧精进的知识对话、加快非

洲研究的人才培养、创新国际交流多元平台、深化中非“一带一路”合作、推进中非传媒交流的践行路径,以期实现“汇聚中非学术智库资源,增进中非人民相互了解和友谊”之目标。张永宏则提出以习近平主席贺信精神为指导,全面提升高校非洲研究水平的三大着力点,即重基础,加强基础研究和人才培养;补短板,推进专业化与智库建设;创特色,增强本土创新能力。上述专家的理论文章有力推动了国内非洲学界对贺信思想内涵的理论阐释与实践探索。

2 非洲政治研究

2020年非洲政治发展的一些传统议题研究得以延续并进一步深化,重点关注了政治发展史、政治思潮、政治制度、政党政治等议题。

关于非洲政治发展史,李鹏涛、陈洋以马克思关于殖民主义的双重使命为理论基础,提出非洲殖民地国家呈现出的专制性、外倾性以及力量有限性等基本特征,深刻影响了当代非洲国家治理,导致独立后的非洲国家出现恩庇主义特征明显、社会与国家缺少有机联系、社会碎片化等现象。探讨殖民地国家的基本特征,有助于我们深入认识殖民遗产”与当代非洲国家治理之间的复杂关系。张春把独立后非洲国家的政治治理分为继承性治理、本土化治理、西式民主化治理和自主化治理四个阶段,认为如何合理、有效地平衡内部自上而下的政府治理与自下而上的草根治理,以及外部悬浮的地区治理和强加的西式治理,既是制约非洲政治治理发展的历史性桎梏,也是其未来发展的潜在突破方向。沈晓雷从土地改革的视角对津巴布韦的政治发展问题进行了历史梳理,认为自1890年之后津巴布韦形成了“土地就是政治”的逻辑关系,而失当的政策取向会导致政治分立、种族主义和政治暴力等一系列政治后果。

关于非洲政治思潮,非洲社会主义由来、发展、理论和实践曾成为20世纪80年代中国非洲研究学者的重要议题,而在2020年该议题又有相关成果发表。郑祥福、舒文豪将非洲社会主义运动置于马克思主义在非洲的传播与发展全球视野中来考察,认为马克思主义是非洲社会主义运动的理论来源,而非洲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实践也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赵希基于阿拉伯社会主义理论的创始者——阿弗拉克和埃及总统纳赛尔社会思想言论的一手材料,从内涵、动机、理论来源和实践四个方面,比较了两者的阿拉伯社会主义思想的异同性,深化了学界对阿拉伯社会主义的认知。同样以非洲大国埃及为研究案例,孙晓雯分析了埃及共产主义运动逐渐式微的原因,即埃及共产党内部的分裂与分歧、埃及政府的镇压、群众基础的缺乏以及苏东剧变后社会主义阵营的衰落等综合因素作用之结果。

关于非洲政治制度,非洲民主化的开局、困局、破局一直是学界研究非洲国家政治制度的关注点。张宏明通过梳理非洲民主化发生、发展的演化过程,尝试回答了如何辩证地看待非洲民主化萌发的内外因之间的关系、非洲民主开启的影响因素有哪些、非洲民主化实践在哪些方面背离了西方民主化理论的“先验”认知、非洲国家民主转型失范的缘由何在、非洲国家的民主巩固为什么进展缓慢,以及如何评估非洲政治民主化等一系列问题。他认为,以政治多元化特别是多党制为特征的非洲民主化,既是新旧国际格局转换之结果在非洲大陆的逻辑延伸,也是政治发展国际潮流和全球民主化运动的组成部分;既是非洲国家自主探索其政治发展之路的持续过程,也是跨世纪非洲国家系统性社会变革的组成部分。黎文涛对于当下非洲民主政治生态的研判是:西式政体形式与本土政治传承之间的碰撞、磨合是非洲政治发展的一条主线,非洲国家通过自我调适和改良,推动两者之间的融合,缓解了非洲政治中的一些痼疾,但非洲多国出现的“第三任期”现象对其政治稳定造成了冲击。刘伟才围绕《2019年赞比亚宪法修正案》,着重评析了修宪对赞比亚民主政治发展的影响:修宪使反对党获得新的活动空间,使基督教组织的参政更深入,增强了非政府组织和政府的对抗性,冲

击了酋长等传统力量且与现代政府形成平衡和默契。

关于非洲政党政治，政党的治国理政能力与国家政治发展密切相关。王学军从全非宏观层面归纳了非洲政党政治演化的六方面新特点：一党主导型政党呈现下行趋势；政党组织建设在一些国家日益受到重视；政党和国家领导代际更替问题不断显现；政党一族群关系具有复杂化和弱化态势；宗教组织对政党政治的影响正在上升；传统制度在非洲政党民主政治中局部复兴。未来，非洲政党政治将出现四方面新动向：发展、安全和主权等问题主导的竞选议题结构逐渐形成；新型总统候选人登上政治舞台；平民主义竞选路线兴起；竞选和执政中出现政党集群化新态势。张凯分析了南非非国大主导党体制所经历的由巩固强化向逐步走衰的变化过程及其原因，认为南非主导党体制能否得到延续和巩固，主要取决于非国大及其领导的政府能否有效维护党内团结、推动三方联盟实现重组、提高国家治理效能，并从根本上促进经济社会实现结构性转型，进而解决南非长期存在的失业、贫困和不平等三大痼疾。

3 非洲经济研究

2020年，国内学界对于非洲经济的研究主要围绕以下三大问题展开。

关于新冠肺炎疫情与非洲经济的关系，黄梅波、邱楠认为，基于非洲国家经济发展的脆弱性，该地区受到疫情冲击的负面影响尤甚。这既有国家、地区经济治理自身的原因，更是由它们的外向型经济结构和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所决定的。在后疫情时期，非洲国家需加强公共卫生治理能力和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加快经济结构转型，增强经济增长内生驱动力；化危为机，大力发展数字经济等新经济业态；促进非洲自由贸易区发展，推进区域价值链建设。李雪冬、董锐指出，新冠肺炎疫情重创了非洲经济发展，加剧了非洲国家债务困境，粮食安全问题凸显，增大了社会不稳定的风险。周玉渊则认为，疫情对非洲经济带来的多重影响主要表现在：国际需求锐减，对非洲经济增长和产业链建设带来重大冲击；外部融资减少给非洲国家产业发展带来严重影响；非洲国家为抗击疫情采取的“隔离经济”措施，抬高了政府财政赤字率。

关于影响非洲经济发展的长期结构性因素，舒运国基于长时段的历史观察，对独立以来非洲国家60年的经济发展道路进行了系统梳理，总结了影响非洲经济发展的五大根源性问题：长期的政局动荡与经济持续发展的矛盾、经济发展模式外部性与本土适应性的矛盾、单一经济殖民遗产与完善的民族经济体系的矛盾、严重依赖外援与自力更生的矛盾、人口快速增长与经济协调发展的矛盾。如何破解上述路径依赖，是非洲国家未来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李小云等学者以全球化为研究语境，指出非洲农业问题是不同阶段全球化影响下的政治经济现象，传统的商业资本主义和工业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对非洲农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外部的强力干预使其农业自主发展的空间被大大压缩，弱化了其农业发展基础。

关于非洲经济形势，张忠祥、陶陶认为，虽然自2014年以来非洲经济增速放缓，但仍有不容忽视的亮点：众多非洲国家包容性经济增长取得积极进展；经济转型共识加强，数字经济兴起。朴英姬以东非地区为研究切入点，提出加速推进经济结构转型、构建助益私营经济发展的制度环境、推进经济特区建设、加大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源投资力度、挖掘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的潜在效能等构建东非经济新模式的思考。

4 非洲国际关系研究

非洲国际关系研究选题注重现实问题与学术命题的有机结合，关注新领域和新问题，体

现学者学以致用治学倾向。

关于非洲在变化的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格局发生深刻而复杂的变化。那么，非洲国家在国际关系出现新调整、新变化情势下，在剧烈变动的世界格局中将处于什么样的位置？李新烽指出，西非法郎三大改革和非洲自贸区正式成立是反映“非洲之变”的两个具有代表意义的事件，从中可折射出正在发生的非洲百年变局；非洲国家是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整体性崛起中的重要成员，是世界大变局中“东升”的重要力量。刘中伟认为，目前非洲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的地位继续走高，主要体现为：在大国战略博弈加剧的背景下，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与俄罗斯越来越重视非洲的战略价值，“抢滩非洲”，使得大国对非关系掀起新一轮“非洲热”。

关于大国与非洲关系，鉴于欧美是影响非洲地区局势发展的主要外部力量，中国学者由此持续关注大国与非关系。赵雅婷基于欧盟于2020年3月发布的《对非洲全面战略》的政策文件，判断未来欧非呈现三大特点：欧非在贸易投资与和平安全方面的合作将进一步深化；移民问题将是影响未来欧非关系的重要议题，但在近期达成共识的可能性较低；受疫情冲击，欧盟在非影响力或将下降，欧非关系的不确定性增强。彭姝祎认为，马克龙政府非洲政策的实用主义色彩突出，对非关系欲从“法非特殊关系”走向平等和透明，将“反恐”列为首要议题，继续使用发展援助这一重要的传统工具，推进经济外交并积极开拓非法语国家市场。李凯旋关注2013年以来意大利对非政策调整问题，其政策重点是积极构建双边对话平台，完善发展合作体系，对能源、贸易等经济议题以及与安全挂钩的移民议题提升了关注度并投入了更多资源。马汉智聚焦美国在非洲实施的“电力非洲倡议”，认为该倡议的重要意图之一是将其视为遏制中国在非洲影响力的重要工具，塑造美国在全球电力领域主导权，但美国在非洲国家推进该项目过程中，存在以优化投资环境的名义干涉非洲国家内政之弊，且会导致非洲债务问题加重。

关于非洲国家间关系，国内学界有三方面的研究成果。对于非洲国家外交政策与政治精英的外交思想，郝诗羽、段九州分析了塞西执政以来埃及的非洲政策取向与变化，认为其着重采取了加强与非洲国家的关系、积极参与非洲反恐事务、推动非洲一体化等务实举措。对于非洲国家间安全合作，王涛认为集体安全机制下的非洲常备军是非洲大陆在安全领域联合自强的重要成果，基于内在机制问题、资源配置不均等多重因素制约，非洲常备军分散化发展态势存在消解非洲大陆安全整合努力的风险。张凯论证了南非参与非洲冲突解决与重建、多边机构的非洲维和行动等方面的有效性，也指出囿于自身实力、和平安全建设方式的国际认同、复杂的安全形势等因素而弱化了其成效。对于地区经济合作，原计划于2020年7月1日正式启动的非洲自由贸易区引起了国内学界的热议。朴英姬基于《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协定》，系统阐释了非洲自贸区建立的目标、机制框架、核心内容和运作机理，研判这一全球范围成员数量最多的自由贸易区将在贸易、投资、统一大市场方面带来规模经济效应。朱伟东、王婷则针对非洲区域合作中的成员身份重叠现象，从法律视角指出消解非洲区域经济组织成员身份重叠现象之路径。

关于中非关系，中非关系和中非合作何以实现深化与升级？中国如何处理好与非洲传统大国、新兴大国的利益关系？这些迫切需要回应的时代议题引起学者的研究兴趣。对于中国对非战略与机制问题，张忠祥系统梳理了中非合作论坛20年取得的成就，并归纳出成功经验：领导重视，优化了论坛的顶层设计；平等协商，契合非洲经济转型的需求；合作共赢，惠及双方利益；与时俱进，内容不断调整充实；机制保障，各项举措落实得力；南南合作，为发展中国家共谋发展。李安山以强烈的“问题意识”，正视西方对中非关系快速发展产生的焦虑、偏见和忌妒情绪，以及部分西方媒体针对中非合作进行各种无端指责，提出中国需

客观认识中非合作在国际发展合作中的地位及其在各国引发的实际反应,同时警惕国际上某些“捧杀”“中国模式”的做法,趋利避害,推动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行稳致远。对于中非合作各领域的研究,学界相关著述涉及资源开发、环境、投资、援助、安全、文化、科技、发展经验分享等方面,而中非应对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进行的抗疫合作研究是新“亮点”。刘海方基于大量实证资料,解析了中非团结抗击疫情的双向互助性,中非双方各尽所能地相互声援、捐资捐物,官民并举,生动诠释了中非患难与共、守望相助的兄弟情谊,以及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意蕴。贺文萍从中国视角指出,中国在援助非洲抗疫物资、派遣医护专家、提供培训和分享防控防治措施与经验、呼吁国际社会重视援非并率先采取行动等方面均体现出高度的责任担当。对于中国与其他大国和非洲关系的研究,杨娜基于竞合性视角,认为中欧双方在支持维和、协助非洲产业转型、推动第三方合作以及开发新技术和新能源方面具有利益汇合点,在推动非洲“可持续发展”和“可持续安全方面”,双方可协同发挥作用。

5 非洲民族问题研究

非洲大陆基于殖民遗痕,其多民族国家分为有主体民族国家和无主体民族国家两种类型,且跨国民族情况普遍存在,是世界民族问题的热点地区,也是研究非洲的一个极具价值的独特切入点。

关于非洲民族研究中的概念界定,蒋俊对于非洲民族研究中常用的“部落”“部族”“族群”与“民族”四个概念展开理论探讨,较详细地梳理了上述概念的起源、发展与流变,关注它们在西文语境中的内涵与演变、中文语境下的特殊表达,进而明确其在非洲语境中的适用性,即部落是20世纪60年代前人群的主流概念,因其“过时”而慎用;中文语境中的部族,因难以对应非洲具体情况而弃用;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族群逐渐取代部落,被用来指称非洲国家基本的人群构成单位;民族指非洲各国的国族。

关于民族国家建构,国内学者聚焦具体国别研究。张玉友通过分析摩洛哥柏柏尔人问题的由来及演变,认为该族群国际化现象业已形成,它们正在以超越主权国家的群体力量,寻求跨境民族认同,以实现想象中的“柏柏尔语言和文化共同体”,其分离主义消极倾向给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认同带来挑战。梁娟娟指出,生活在苏丹东部地区的贝贾部落,其身份标识是托贝达维语、迪瓦卜体系与斯里夫制度,受历史痼疾积累与现实边缘化政策延续的双重影响,贝贾部落潜在的分裂意识成为国家治理中的不稳定因素。徐薇、麦晓晴用“身份认同”“身份政治”“新部落主义”等概念揭示了南非非黑人少数族裔阿非利卡人所经历的社会转型与身份变化,探讨了后种族隔离时代阿非利卡人中出现回归“部落”、抱团取暖、自我隔离的现象,尝试回答了如何在一个多种族、多族群、多元文化共存的国家构建统一的身份认同这一重要而紧迫的问题。

关于族群政治,这是多族群非洲国家普遍存在的一种政治现象,是基于族群利益并诉诸政治权力的族际互动,很多时候表现为对抗甚至冲突的形态。对于饱受战乱之苦、部族冲突的索马里,王学军认为在国家重建过程中,应正视长老制度、习惯法等传统政治文化,并可在地方和国家两个层面发挥其正向作用,体现在冲突和解、安全秩序维护及国家重建进程参与等方面。蒋俊从族群政治视角探讨了卢旺达大屠杀何以发生,认为该国独立初期胡图族与图西族进行了激烈的权力争夺,并建构起一种割裂和对立的族群政治。对立的族群政治立场和以族群为界限的排他性统治,始终以显性或隐性方式存在。基于族群政治所拥有的庞大社会基础,族众易被充分动员和组织起来,对于突发事件应激反应,被赋予“族群名义”的大屠杀遂成为卢旺达族群政治演化的产物。曾爱平剖析了以奥罗莫族、阿姆哈拉族等族群为基

础的政党，其与极端民族主义思潮相耦合，在国家政治治理方面相互倾轧，给民族自治州制度带来严重的负面冲击。

关于族群关系，突破不同民族之间的隔阂与分野，促进民族融合，对于非洲国家而言是一个长期过程。沈晓雷认为津巴布韦两个最大的民族——绍纳族与恩德贝莱族之间的民族矛盾，既与历史上殖民统治的“分而治之”政治遗产有关，也与津巴布韦政府长期实行的民族高压政策息息相关，当下采取民族和解和团结政策、弥合两大民族之间的裂痕与化解积怨则为民族整合所必需。胡洋追溯了刚果（金）东北地区土著与移民冲突的由来和发展历程，认为历史因素与地区的结构性矛盾是诱发冲突的直接原因，政府偏颇的民族政策、对族群问题的管理缺失及周边国家的干预，导致土著与移民之间的冲突不断升级扩大。梁益坚、刘国强从历史溯源视角解读了南非长期存在排外现象的致因，即长期的种族隔离在社会结构、文化认同、行为方式和发展进程等层面对南非社会造成的深远影响直到当下依然存在；解决南非排外问题，需要从种族主义层面来认识和治理，通过泛非主义来消除自卑、自恨的畸形心理，通过心理上的解放来消除种族主义的遗毒。

回望 2020 年，审视非洲研究取得的重要进展，国内学界仍需要补齐短板，完善学科体系，着力加强非洲国别与区域研究的精细化，探索理论与研究新方法，提升学术话语传播力与影响力。

执笔：安春英（中国非洲研究院）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 年 4 月 15 日第 004 版

从文化管理走向文化治理

近年来，我国“互联网+文化”发展蔚为壮观，“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层出不穷。如何抓住数字文化发展高峰期到来的契机，加快推进文化管理体制变革，成为我们需要面对的重要问题。

1 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

“我国传统的文化管理体制是文化行政管理部门自己办文化的体制，2003 年以来的文化体制改革启动了从‘办文化’向‘管文化’的转变。”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晓明认为，从文化管理走向文化治理应成为我国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一个必然趋势和方向。中央财经大学文化产业系主任周正兵表示，我国文化管理体制既有作为宏观管理制度的一般属性，即基于市场配置资源基础上的政府规制，又有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重要构成的特殊性质，即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有着明确的目标——“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强调“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基本原则。所以，社会主义文化管理体制要兼顾这两种特征，特别是在导向正确的前提下，最大程度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优势，建立现代文化产业体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文化管理体制。

我国的文化产业管理体制是以政府为主导的，政府部门对于文化产业的发展目标、建设任务以及运作模式等方面具有很强的指向作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文化与休闲产业研究中心

主任吴承忠提出，政府的主要职责之一就是制定规划，实施发展国家文化产业的相关战略，并对文化产业市场进行规范。我国高度重视通过政策手段对文化产业进行规范。近十年来，我国不断通过改革的方式来提升文化产业的政府管理效力，在文化产业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出台多项涉及提升政府效率、政企政事分开、完善行政审批制度、提高资产运营效率等方面的政策文件，为各地发展文化产业指明了方向。

2 进一步深化文化管理体制变革

随着我国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调整，文化产业也逐渐繁荣发展。吴承忠认为，目前我国文化产业管理体制还不能很好地适应当前的发展特性。人才管理机制落后也是文化产业管理机制当中存在的重要问题。我国文化产业高水平管理人才稀缺，对该类人才的管理和激励不足以调动其积极性，导致现有人才严重浪费。

周正兵表示，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方向、原则与市场宏观管理体系之间还存在一些阻碍文化繁荣和发展的制约性要素。一方面，随着文化体制改革的深入，艺术领域积极推进政资分开。政府从管理国有艺术单位的微观事务中摆脱出来，却尚未实现重心向宏观管理与公共服务的转移。另一方面，市场配置资源的机制有待完善。市场主体建设有待加强、相关政策顶层设计急需健全、现有绩效评价标准有待完善等，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文化管理体制改革的进程。

南京大学长三角文化产业发展研究院院长顾江表示，文化产业管理区域、要素流动壁垒有待打破，各地文化产业管理缺乏区域一体化发展意识。另外，文化市场准入退出机制尚待健全、文化事业单位内部制度有待完善、文化企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难以平衡等，都是文化管理体制亟待完善的问题。

我国文化产业已经跃入一个以数字化和网络化为先导的全新发展阶段，数字技术使一些传统行业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张晓明认为，我们需要用新的体制去适应新技术所产生的这些领域。

如何为文化领域社会价值的实现提供坚强的制度保障？为此，周正兵提出三方面的具体建议。第一，在公共投入方面，要优化财政投入方式，建立绩效预算制度。第二，在国有企业管理方面，要优化企业制度设计，引入金股制度。第三，在个体支持方面，要总结现有文化消费券经验，建立规范的文化消费促进制度，为文化产品社会效益的最大化发挥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顾江提出，政府应把握方向使文化政治职能、文化经济职能、文化社会职能有效发挥作用，减少部门之间职责交叉和多头管理的弊端。要加强区域联动，促使科技、人才、技术、信息等文化产业要素汇集，打破区域行政壁垒，为文化产业奠定良好的发展基础。政府还需降低市场准入门槛，扶持多种所有制形式的文化企业。从组织架构、企业文化、人力资源等角度加强文化事业单位内部控制的建设和完善。激发企业活力，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建立提升文化企业社会效益专项基金，优先扶持以社会效益为主的文化项目；完善文化企业内部考核机制，将社会效益考核和经济效益考核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

作者：孙美娟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年4月21日第001版

最大外资流入国的底气

不断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和相关配套改革，并在构建更加系统完备、更加成熟定型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不断释放红利，才是我们吸引外资的最大底气。

总投资超 100 亿美元的巴斯夫（广东）一体化项目，首批装置建设已实现连续 50 万工时的安全建设；江西最大外资工业项目锐晶科技功率芯片制造项目顺利开工；山东 94 个重点外商投资项目集中签约，超 114 亿美元总投资涵盖高端装备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高新领域……今年以来，重大外资项目加速落地的喜讯不断传来。

稳外资的喜讯，还不止于此。2021 年度《中国商务环境调查报告》显示，61%的受访外资企业认为在其近期的全球投资计划中，中国是前三大投资目的地之一。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布的《全球投资趋势监测报告》也显示，2020 年，中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逆势增长 4%，总投资额达 1630 亿美元，一跃成为全球最大外资流入国。

能跃升为全球最大外资流入国，中国的底气何在？短期看，中国在全球率先控制疫情，率先复工复产，率先实现经济增长由负转正，使外商投资预期更稳，信心更足。长远看，中国市场如同一块巨大的磁石，散发的巨大魅力与蕴藏的无限潜力使外商投资纷至沓来。

那么，中国市场的魅力和潜力究竟是什么？这种魅力与潜力当然少不了中国市场的资源禀赋。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拥有全球最大的中等收入群体，中国的消费需求多种多样并不断升级，庞大的市场规模和消费潜力是供给体系持续优化的动力，也是投资热点不断显现的基础。中国又是幅员辽阔的发展中国家，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尚未基本实现，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也意味着巨大的投资空间与市场机遇。作为连续 11 年稳居世界第一制造大国的主要经济体，中国完备的工业门类、齐全的配套设施、高素质的产业工人队伍等，也是其成为投资理想目的地的重要因素。

然而，资源禀赋优势不等同于国际竞争优势，中国吸引外资全球排名的跃升也不是完全依靠“天赋”。一个强大的市场，要兼具规模性、竞争性与联通性。以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做支撑，在公平透明的市场规则下实现资源高效配置，才能将投资吸引来、留下来。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我们从培育市场到构建市场体系、建设现代化市场体系，再到今天加快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不断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和相关配套改革，并在构建更加系统完备、更加成熟定型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不断释放红利，这才是我们吸引外资的最大底气。

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是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内容，也是我们持续成为吸引外资高地的决胜“密码”。从施行《外商投资法》《优化营商环境条例》，为稳外资提供法治保障，到逐年缩短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和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不断降低外资准入门槛，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开放水平越来越高，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蹄疾步稳。无论是特斯拉上海工厂的当年开工、当年投产、当年交付，还是今年继续对第五批重大外资项目给予产业规划、用地、环评、用能等政策支持，都彰显了我国坚定不移以更高水平开放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决心与信心。

从这个角度审视，稳外资的成效，既是外资对中国发展前景投下的“信任票”，更是中

国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成绩单”。而这个开年的“成绩单”，响当当！

作者：楠溪

来源：《人民日报》2021年4月14日第018版

新苏伊士运河危机 与全球供应链的系统性风险

“长赐号”堵在了运河，虽然是意外事件，但是，脱困是可预期的，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可控的风险，但如果今后发生不可控的危机，对全球市场的冲击又将如何呢？

一艘超级货轮横在了苏伊士运河，一个多星期才从运河脱困，地中海和印度洋上数以百计的船舶被“堵塞”。苏伊士运河是全球最繁忙的水道之一，巨型货轮完全堵死了运河，由此造成运河中断，有人说，这是一场新的苏伊士运河危机。与上个世纪50年代的苏伊士运河危机不同，这次堵塞事件其实是全球供应链的系统性风险的暴露，并不是地缘政治冲突造成的危机。从苏伊士运河堵塞事件，我们能够看到，当下世界经济是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如此绵密的供应链体系是当下国际秩序的“物质基础”，也是国际关系的“经济基础”，更是国际和平与发展的“静水深流”。

3月23日，“长赐号”货轮在苏伊士运河“卡”住，长达400米的大货轮横在了运河两岸，造成了运河的“梗死”。每天经过苏伊士运河的商船，承载着约100万桶原油和8%液态天然气，以及占全球贸易至少12%的商品，每天滞留货物的贸易金额估计达96亿美元，相当于每小时4亿美元/330万吨货物，每分钟670万美元。这些数字的背后是什么呢？是全球经济贸易的基本图景。每艘货轮承载的商品背后是全球的产业分工体系，是供应链的网络以及背后的价值生产与分配体系。在运河堵塞的一周中，有大约370艘油轮、货轮和其他船只滞留在运河两端。运河堵塞一周，造成的损失是巨大的，也会涉及到复杂的赔偿问题，货轮的制造商、运营商以及保险公司等，这又是非常复杂的经济关系，同时涉及到运输风险及其分担的问题。

这次“长赐号”堵塞运河，的确是偶发的意外事件，但当我们看到大货轮结结实实地“卡”住运河的照片，就能看到“苏伊士运河危机”深层次的问题，进一步说，这是全球供应链的系统性风险的暴露。

首先，20万吨级别的大型货轮越来越多，在21世纪初，能够装载7000-8000个标准集装箱的货轮已经算是大型货轮了，而现在能够装载两万个集装箱的货轮才算是“巨无霸”。苏伊士运河、巴拿马运河等水道都经过了多次的扩建，以适应巨型货轮的需要。“长赐号”堵塞之后，人们意识到，如此巨型的轮船为什么要走运河呢？原因很简单，苏伊士运河给埃及带来了巨额的收入，为了增加和保持这项收入，埃及当然希望更多的船经过运河，而对于航运公司来说，苏伊士运河大大减少了航程，比绕道非洲好望角要近的多。

其次，最近20年来经济的发展，尤其是贸易的发展依靠海运支撑，能源、矿产、商品

等通过全球海运系统连接在一起，顺应了亚洲国家经济发展的需求。为了降低成本，运输船舶越来越大，集装箱也越来越多，可以说，集装箱运输是世界贸易发展的基础，运输革命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发展。

最后，海运以及贸易的发展助推了全球的产业分工与合作，中间品贸易成为全球贸易的主要形态，换句话说，如果不是有发达的、低成本的海上运输体系，产业的分工与合作体系就不会这么发达。

从“苏伊士运河危机”中，我们看到了全球海运的革命性变化，形成了非常绵密的分工合作关系，这其实是全球供应链的一个缩影。任何复杂的系统都会产生系统性的风险，任何一个环节的断裂可能都会影响到整体，尤其是关键节点。在风险暴露之前，我们或许不会在意。像马六甲海峡、霍尔木兹海峡等关键水道，多半会受到关注，警惕地缘政治风险，比如出现武装冲突，霍尔木兹海峡可能就会关闭，像日本这样的原油进口国，80%的原油要经过霍尔木兹海峡，一旦海峡关闭，对日本的影响是巨大的。马六甲海峡虽然地缘政治风险不是很高，但是海盗等威胁还是存在的，马六甲海峡关闭，运输船只要绕道巽他海峡，成本大大增加了。苏伊士运河堵塞是个意外的事件，没有人能够想到，对全球海运系统造成冲击的是大型货轮“卡”在了运河上，这是海运系统内在的风险，而不是战争或者冲突造成的风险。

海运系统是全球贸易的一环，而贸易是全球供应链的组成部分，这其中的风险令我们深思。如果苏伊士运河的堵塞不是一周，而是一年，会怎样？又或者马六甲海峡、巴拿马运河、霍尔木兹海峡这样的全球贸易通道中断或者关闭又会如何？另外，“长赐号”堵在了运河，虽然是意外事件，但是，脱困是可预期的，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可控的风险，但如果今后发生不可控的危机，对全球市场的冲击又将如何呢？

在最近几年中，供应链变成了一个热门话题，在美国开启的贸易战之下，“脱钩”似乎变成了一种进行博弈的筹码和手段，但是苏伊士运河堵塞造成的巨大损失，让我们看到了全球经济的相互依赖之深，所谓的“脱钩”更多的是一种妄念，供应链系统已经成为全球经济社会生活的基础，就像空气一样，在正常状态，没有人会感觉到空气的存在，但是一旦空气稀薄，呼吸就是个大问题了。维护全球供应链系统稳定，已经是个很大的挑战，以“脱钩”去冲击供应链稳定，岂不是非常无知和无畏？

作者：孙兴杰（吉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所长、教授）

来源：《中国经营报》2021年4月5日第A07版

疫情失控拖累印度经济复苏进程

就在各国疫苗接种进程给世界经济复苏带来希望之际，一些国家疫情又有反复。其中，印度疫情更是急速恶化，其速度和程度超出预期，对经济方方面面的影响也正在逐渐显现。

印度首都新德里从19日22时起实行为期6天的严格封锁措施。在过去几天中，印度每天都有超20万人确诊感染。除了在英国、巴西、南非等国首先发现的变异病毒已输入印度外，位于印度西部的马哈拉施特拉邦采集的样本中还发现一种新的变异病毒。更难控制的双重变异病毒可能使疫苗免疫能力下降甚至失效。

印度血清研究所是世界最大的疫苗生产商，此前莫迪政府一直致力于向境外出口新冠疫苗。然而，面对这波强劲疫情，莫迪政府不得不宣布暂停疫苗出口，断外供保内需，但却依然面临疫苗供应吃紧的问题。印度血清研究所几天前承认，生产链“非常紧张”，并呼吁政府加大资助。为了增加对国内疫苗供应，印度还打算免除新冠疫苗 10% 的进口关税。

停止出口还影响到原本对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疫苗供应，一些国家开始抱怨印度产疫苗订单交付延迟。这种情况加大了全球疫苗供应的失衡。

由于印度疫情失控，据英国《卫报》19 日报道，英国和印度在一份联合声明中宣布，英国首相约翰逊已经取消了原定于下周的访印行程。疫情失控带来的封锁还可能威胁到黄金珠宝销售的复苏。2021 年前三个月，印度的黄金进口量增加了一倍多，零售需求强劲复苏，珠宝商纷纷开始增加黄金库存，黄金交易处于溢价状态。但由于非必要企业已被要求在 4 月份剩余时间内继续关闭，印度刚复苏的黄金需求可能再次面临挑战。

在金融市场上，今年 1-3 月，印度卢比对美元汇率曾小幅上涨，但根据美国彭博新闻社追踪的情况，4 月卢比已成为新兴市场货币篮子中表现最差的货币。外国投资者还开始抛售以卢比计价的资产，4 月迄今累计抛售价值 400 多亿卢比的印度股票，创去年 9 月以来最大规模外资净流出。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计印度经济 2021-2022 财年将增长 12.5%，这将是主要经济体中最高的增速。穆迪更是一度预计 2021 年印度 GDP 增速达 13.7%，但第二波疫情已经使穆迪下调预期至 12%。野村控股经济学家也因此将印度 2021 年的 GDP 预期从此前的 12.4% 下调至 11.5%。这主要是考虑到限制措施的重新实施将抑制经济活动，而且还可能削弱市场和消费者情绪。

印度政府应对疫情的经济刺激政策一直以来都更倚重货币政策而非财政政策，目前印度的实际利率水平已经为负，财政货币政策空间十分有限。不少分析认为，第二波疫情预示今年印度经济复苏之路并不平坦，而结构性瓶颈将继续阻碍印度未来几年经济潜力的释放。疫情能否迅速受控，对印度经济复苏十分关键

作者：周武英

来源：《经济参考报》2021 年 4 月 21 日第 002 版

第三轮疫情紧急状态考验日本经济

4 月 25 日至 5 月 11 日，日本在东京、大阪等地实施第三轮新冠疫情紧急状态。

这次疫情紧急状态，持续超过两周，且适逢日本 4 月底至 5 月初的“黄金周”假期。共同社援引经济学家的分析报道，新一轮紧急状态将打击日本经济复苏的希望，第二季度经济可能又一次负增长。

新一轮紧急状态下，政府将要求百货商场、购物中心等大型商业设施停业，售卖生活必需品的商铺除外；提供酒类和卡拉 OK 服务的餐饮店停业，其他餐饮店 20 时前关门；电影

院、主题公园等娱乐设施停业；体育比赛等大型活动原则上不得允许观众入场。

日本去年4月初开始在东京等地实施第一轮紧急状态，同月中旬扩大至全国，去年5月底前陆续解除。第二轮紧急状态今年1月初开始，陆续覆盖东京、大阪等地，3月下旬完全解除。

第一轮紧急状态实施后，日本去年第二季度经济按年率计算萎缩29.3%，创历史纪录。今年第一季度经济数据预定下月发布，许多经济界人士持消极态度，预计再度萎缩。日本经济研究中心本月早些时候就30多名经济学家对经济的评估发布调查结果，预计今年第一季度经济按年率计算比去年第四季度减少6.09%，但第二季度将反弹。

然而，由于日本第四波疫情迅速扩散，对第二季度经济的乐观预期逐渐减弱。共同社报道，大和综合研究所资深经济师神田庆司认为，由于实施第三轮紧急状态，日本今年第二季度经济将又一次负增长，国内生产总值每月减少6000亿日元（约合56亿美元）。而且，“我认为紧急状态不会按照政府计划在几周内结束，可能会延长至两个月左右，且覆盖地区可能扩大”。如果再次扩大至全国，经济损失将更大。

三井住友银行日兴证券公司首席经济师丸山义正预计，第三轮紧急状态将导致消费比第一季度减少1.3万亿日元（约合121亿美元），第二季度经济按年率计算将萎缩4%。

野村综合研究所经济师木内登英23日预计，东京等4个地区的经济将因第三轮紧急状态损失大约7000亿日元（约合65亿美元）。

医学专家警告，最新一轮疫情中，传染性更强的变异病毒正在大范围传播。日本厚生劳动省方面估计，大阪和兵庫的病例中，感染变异病毒的病例占大约八成；东京的病例中，变异病毒病例比例正在快速上升。

日本政府新冠病毒对策分科会（即新冠专家小组）会长尾身茂预测，如果疫情没有显著改善，第三轮紧急状态可能延长。

“实现普遍接种前，经济复苏的步伐将放缓。”丸山义正说。日本疫苗接种进度相对慢，目前接种率仅为大约1%。

作者：惠晓霜

来源：《经济参考报》2021年4月29日第002版